

的夏商周三代的 217 组文物进行年代学和器物学的布排，从上古（青铜）文明的角度来回答“何以中国”这个宏大的国家命题。民族国家作为一个现代图腾，它的意识形态认同需要征用和转换传统的文化资源，这个国家认同动员工程对于任何现代国家都是不可或缺的。中国在这方面的得天独厚（“受神宠”的世俗说法）之处在于，我们的文化认同可以直抵国家疆域内最早的文化遗存。上海博物馆选取夏代晚期网纹鬲，商代中期兽面纹方鼎和战国晚期“嵌金银团花纹带流鼎”，分别作为三个时代的象征，清晰地表明为中国所特有的钟鸣鼎食的礼乐文化从来都不曾间断过。在世界五大古文明区域中，只有中国如此。

一条无法跨越的河流

古埃及文明早在公元前 525 年就被波斯人强暴了，沦为波斯帝国的一个行省。后来又遭遇马其顿—希腊和罗马的长期殖民化征服，土著社会萎靡不振，宫廷和城市上层都说古希腊—拉丁语并以此为傲。公元 7 世纪阿拉伯帝国宣称要把包括埃及人在其内的中东从西方的殖民奴役中解放出来，结果却是埃及彻底的阿拉伯化（种族上）和伊斯兰化（文化上），本土的科普特语完全退出日常应用。夕阳下的金字塔在说阿拉伯语的当代埃及人眼中更多作为旅游资源，或者像对外来旅游者一样，成为一种文化奇观：在并不看重肉体的伊斯兰信仰中，构建这么大的建筑物来保存一个人的尸体有什么意义呢？今天的埃及



右图：埃及金字塔。

人与当年修建金字塔和躺在金字塔里的人们之间，横亘着一条无法跨越的河流，他们站在两岸相互打量，却没有对话。今天的埃及人当然也会为“他们的”金字塔而骄傲，但骄傲是抽象的，骄傲的原因只是因为它们恰好落在了埃及这个现代国家的疆域内。而且这个现代国家的界线也是由他人（西方殖民者）划定的，所以埃及在陆地上与邻国（利比亚、苏丹）的界线是笔直的几何图形，负责划线的殖民者并不认为这个国家有什么特殊的历史、文化传承值得在界线上予以体现或尊重。

出现于公元前 2000 年代的古印度的青铜文化令人印象深刻：二百多个城市遗址像一长串断了线的珍珠撒落在印度河流域的广阔地区，其中的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巴两城甚至发现了公共照明以及管道排污系统的遗迹。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如此接近现代建城理念的城市建筑居然是在文字和沟通手段极其原始的条件下完成的：它的文

字——如果那些符号也算一种文字的话——只出现在印章上，考古发现的刻有文字图案的印章一共有 2500 枚，但从中提取出来的文字符号只有 400 多个。在公元前 1500 年左右经历了一场无法断定是人为的还是自然的巨大灾变之后，这个在考古上被称为印度河文明的古文明在整个印度河流域同时消失了，之后来到这里的是完全不同的一群人，来自高加索的雅利安人。他们与印度河文明的毁灭之间的关系至今仍在争论中：到底是他们的到来毁灭了古文明？还是他们利用了古文明的毁灭所造成的权力真空才来到这里？不管怎样，他们的到来代表着这个次大陆告别了一种乐世主义的文明范式，开始转向极度的禁欲主义和内省。所以，即便后来（20 世纪 20 年代）印度河的城市遗址被发掘，它的文化轮廓也不可能被拼凑出来。属于青铜文化的城市遗址静静地躺在那里，但它与印度当下的社会生活完全无关。

右图：
（左）摩亨佐·达罗
（右）哈拉巴

